

抗战时期民营企业的地方适应机制——以中元造纸厂内迁为例

代济帆^{1*}

(¹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四川 成都 610072)

摘要: 抗战时期, 大批沿海民营企业迁入内地, 其存续的关键并不在于完成空间转移本身, 而在于能否在迁入地完成地方适应, 重建稳定的生产与经营条件。中元造纸厂内迁宜宾后, 由东部技术型试验机构逐步转变为西南后方重要纸厂, 其地方适应主要依托国家统制支持、地方资源供给与企业组织能力的相互结合。战时制度网络为企业区位重置和资源获取提供了重要条件, 地方电力、原料、土地与运输体系构成企业恢复生产的基础, 人才培养、内部制度建设和产品市场拓展则推动企业进一步嵌入地方社会与区域市场。与此同时, 能源短缺、资金压力和战后资本外移也表明, 战时民营企业地方适应机制的形成与持续, 既受到国家动员、区域资源、市场环境与企业治理等因素的共同作用, 也面临现实条件的制约。

关键词: 抗战民营企业; 工业内迁; 地方适应; 中元造纸厂; 经济史

DOI: <https://doi.org/10.71411/rwxk.2026.v1i5.1445>

Local Adaptation Mechanisms of Private Enterprise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 Case Study of the Inland Relocation of Zhongyuan Paper Mill

Dai Jifan^{1*}

(¹ Sichu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Master's Student, Institute of History, Chengdu, Sichuan, 610072,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 large number of private enterprises from coastal regions relocated to China's interior. The key to their survival lay not merely in the completion of spatial relocation, but in whether they could adapt to the local environment of their new sites and rebuild stable conditions for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After Zhongyuan Paper Mill relocated to Yibin, it gradually transformed from a technically oriented experimental institution in eastern China into an important paper mill in the southwestern rear area. Its local adaptation mainly depended on the interaction among state support under wartime control, the supply of local resources, and the enterprise's own organizational capacity. The wartime institutional network provided important conditions for the enterprise's lo-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术新苗课题项目《抗战时期沿海内迁民营企业的在地化研究——以中元造纸厂为例》(项目编号: 202506043)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代济帆(1998-), 男, 四川自贡, 硕士, 研究方向: 中国近代史。

通讯作者: 代济帆, 通讯邮箱: 79871792@qq.com

cational readjustment and access to resources; local systems of electricity, raw materials, land, and transportation formed the basis for the resumption of production; and talent training, internal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and product market expansion further promoted the enterprise's integration into local society and the regional market. At the same time, shortages of energy, financial pressure, and the postwar outflow of capital also indicate that the formation and continuation of the local adaptation mechanisms of wartime private enterprises were shaped by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state mobilization, regional resources, market conditions,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while also being constrained by practical limitations.

Keywords: Private enterprise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Industrial inland relocation; Local adaptation; Zhongyuan Paper Mill; Economic history

引言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工业布局发生显著调整,大批沿海企业迁入西南、西北,形成战时工业空间重组的重要景观^[1]。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工业内迁的总体规模、迁移路线与国家动员,对于企业进入迁入地后如何重建经营条件、整合地方资源、实现持续经营,讨论尚嫌不足。若仅以“内迁”概括这一过程,容易停留于地理位移层面,难以揭示企业存续与扩张的内在逻辑^[2]。基于此,本文提出以“地方适应”作为考察战时民营企业的重要视角。就学术意义而言,将研究重心从迁移过程推进到迁入后的生产重建,这有助于把战时工业内迁研究由政策史、运输史延伸至企业经营史与地方社会史,揭示国家动员如何经由地方资源和企业治理转化为实际产能。就现实启示而言,这一问题也提示我们,在外部冲击导致产业转移和供应链重组时,企业能否稳定落地并持续经营,同样取决于地方基础设施、要素保障、制度协调与企业组织能力的配合。

从已有研究看,抗战工业内迁研究已形成较为清晰的学术脉络。孙果达、黄立人等较早从迁移规模、路线和政府组织层面梳理内迁过程^{[2][3]},张守广等则将内迁企业置于大后方工业体系形成的背景中考察,强调工业内迁对西南、西北工业布局的重塑作用^[4]。此类研究奠定了战时工业空间转移研究的基础,但其问题意识多集中于“为何迁”“如何迁”及政策效果,对企业迁入后如何重新获取动力、原料、劳动力、资金和销路等经营条件,讨论仍显不足。

围绕政府与企业关系及企业个案,江满情等揭示了战时国民政府对民营工厂“扶持与管制并存”的制度环境^[5];蒋宝麟对刘鸿生企业的研究,以及荣氏企业、豫丰纱厂、天厨味精厂等个案研究,则进一步说明企业内迁并非单纯的避战行为,也包含市场重组、经营扩张和原料替代等主动策略^[6]。这些成果推动了内迁研究由宏观政策叙事转向企业经营层面,但对中小型民营企业与迁入地地方社会之间的双向互动,仍缺乏细致分析。

就造纸业而言,既有研究多关注行业产能、纸张紧缺、出版报业用纸危机以及国营纸厂建设,已注意到战时后方纸张供应对文化宣传、军政运转和民生日用的重要性^{[7][8]}。然而,对于民营造纸厂如何依托地方木材、煤炭、电力、水运和制度性订单完成生产重建,相关讨论仍较薄弱。中元造纸厂个案正可在这一空白处展开:它既不同于单纯依靠国家资本的国营企业,也不是完全依赖自由市场的普通民营企业,而是在国家统制、地方资源和企业技术能力交错作用下形成地方适应机制。由此考察中元造纸厂内迁宜宾后的经营重建,有助于从微观层面理解战时民营企业由“空间转移”走向“地方适应”的实际过程。

所谓“地方适应”,是指企业在战争条件下进入新区域后,围绕土地、动力、原料、劳动力、资金与销路等生产要素重新组合,并重建组织秩序与制度关系的过程^[3]。其核心不在于“是否迁到后方”,而在于“能否在后方形成可持续经营能力”。从经济史角度看,这一过程同时涉及国家统制体系、地方经济条件与企业内部治理三重层面。

中元造纸厂是观察这一问题的典型案例^[9]。首先,本文并不以一个个案概括所有内迁民营企业,而是将其作为“中小型、技术依赖型、民生配套行业”内迁企业的代表性样本。其次,与荣氏、刘鸿生等资本规模较大的企业相比,中元造纸厂资本较薄弱,却同样面对迁建审批、贷款、运输、动力、原料与市场重建等普遍问题;与纺织、食品等行业相比,造纸业又兼具军政、文化出版和民生包装需求,能够观察战时统制需求与地方资源开发之间的结合。因此,该案例的价值在于从微观层面揭示一类内迁民营企业由“迁到后方”转化为“在后方生产”的机制,而非作无差别的总体代表。该厂由留德、留法造纸技术人员创办,早年以试验和专门纸张生产见长。抗战后奉令迁川,1939年在宜宾建厂^[10]。档案显示,其建厂、扩张与生产活动始终处于经济部工矿调整处、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央信托局、地方政府与宜宾电厂等多重制度关系之中。与此同时,企业又通过原料替代、设备改装、员工训练与产品调整,逐步完成在地化重建^[11]。本文拟讨论三个问题:其一,战时民营企业研究何以应由“空间转移”转向“地方适应”;其二,中元造纸厂如何在宜宾完成经营重建;其三,该厂战时适应机制如何形成,又有何限度。本文意在说明,战时企业能否存续,取决于其能否在迁入地重建资源获取、组织协调与市场联结机制。

1 战时民营企业内迁的考察视角:从空间转移到地方适应

抗战时期工业内迁首先表现为企业区位的变动,但从企业史层面看,空间迁移并不等于经营重建。对民营企业而言,设备转运、厂址落定只是生存的起点;能否在新区域获得土地、电力、原料、劳动力、信贷与市场,才决定其是否能够持续生产。因而,相较于“内迁”这一描述性概念,“地方适应”更能解释企业由迁入到存续、由复工到扩张的具体机制^[12]。

从经济史分析看,所谓地方适应,至少包括三重内容。其一,企业与国家战时统制体系之间的关系,即迁建审批、贷款支持、运输优待、税收减免和专门订单如何改变企业的资源约束。其二,企业与地方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即厂址、水运、电力、原料与区域市场如何被纳入企业经营过程。其三,企业自身组织能力,即技术储备、制度建设与经营策略能否将外部支持转化为稳定产出。三者相互作用,构成战时民营企业的实际生存条件。

中元造纸厂的迁移过程清楚显示了这一点。1933年,钱子宁、郭开始、朱尊民等在苏州浒墅关设立中元造纸试验所,以试制蚕种纸起步,并获得实业部奖励及专利。1936年又筹设股份有限公司,在杭州购地建厂,说明其原初发展路径是依托东部工业环境推进技术型纸业生产。1937年后,杭州建厂计划毁于战火,设备辗转广西,后经工矿调整处指令改迁宜宾。由此可见,企业迁移方向已明显受制于战时国家配置,而非完全依循原有市场逻辑。

不过,国家指令只是企业迁建的制度前提,并不自动构成经营能力。颜俊儒的相关论文的研究表明,中元造纸厂在宜宾厂址选择上已体现出明确的经济考量:马鞍山一带邻近电厂,可节约输电成本;靠近长江,便于机器与产品运输;川、康两省可供应木材、煤、碱、石灰等造纸原料;宜宾又是川南交通与商贸中心,生活补给较为便利^[13]。换言之,企业选址并非单纯“避战”,而是围绕动力、交通与原料的综合成本进行比较,其判断标准已体现出现代工业经营意识。

材料同时显示,地方适应并非企业单方面完成。1939年经济部工矿调整处致函宜宾县政府,请其协助中元造纸厂解决购地受阻问题,明确指出“后方需纸甚切,纸厂亟应复工”。这一公函说明,中元造纸厂迁建并非普通民间投资,而是被纳入后方生产体系之中^[14]。此后,企业加入迁川工厂联合会,得以在搬运、税收和营业等方面享受内迁工厂优待;更具体地看,1939年2月工矿调整处批准借款10万元作为搬迁费,1941年中央信托局又批准中元造纸厂500万元贷款,用于钞票纸试制与扩建。1944年中央信托局与中元造纸厂签订钞票纸供应合同时,预付2500万元;同年12月双方续订合同时,合同规定供给钞票纸17万令,每令500张^[11]。由此可见,战时制度支持并非抽象背景,而是通过搬迁贷款、扩建贷款、预付款、运输协调和电力保障等方式,实质性改变了企业的资金约束和生产条件。企业、国家与地方由此形成围绕战时纸张供给的制度

联结。

但若无企业自身能力,上述支持亦难转化为生产成果。中元造纸厂创始团队多受过系统造纸专业训练,具备制浆、抄纸、机械改良等技术能力。入川后,企业能够在外来原料断绝、电力短缺和设备残缺的条件下试制化学木浆、改装旧纸机、拓展纸张品类,说明技术能力是地方适应的重要基础^[15]。因而,战时民营企业地方适应的实质,不是简单依赖国家庇护,而是国家制度支持、地方资源条件与企业组织能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由此观之,战时民营企业“内迁”不宜仅被理解为一次空间位移,更应视为企业经营体系的再组织过程。中元造纸厂从苏州、杭州到宜宾的迁移,表面是厂址转移,实则是生产函数、资源结构与市场方向的整体重构。其后的厂房建设、原料替代、产品转向和组织扩充,均是这一地方适应过程的展开^[16]。

2 中元造纸厂内迁后的经营重建:生产条件转换与地方资源整合

1939年中元造纸厂迁抵宜宾后,面临的核心问题不是扩张,而是复工。据档案显示,该厂先在白沙乡螃蟹湾、红岩等地购置土地30亩,后又续购扩建用地;同年7月平地建棚,9月正式修筑厂房^[11]。这一阶段的经营重建,本质上是将原有东部技术—资本组合重新嵌入川南地方经济结构,其关键在于动力、原料、资金与市场四个环节的重组。

首先是动力条件的转换。造纸业为典型的动力密集型行业,连续电力与蒸汽供给不可或缺。但据袁为鹏教授的《聚散与扩散:中国近代工业布局》一书可见,宜宾初期电力供给极为有限^[17]。1940年1号纸机虽已投产,木料切片、输浆、洗漂等环节仍多依赖人工;打浆时甚至需人力协助带动机器。宜宾电厂最初仅能以小型柴油机提前供电,至1941年蒸汽发电机投产后,供电状况方有改善,但生产时长仍受明显限制。中元造纸厂的复工因此并非建立在成熟工业基础之上,而是在地方能源供给不足条件下实现的低水平启动。这一情形表明,后方工业建设常常并非“工业搬迁”的简单复制,而是企业在基础设施不足约束下进行的再适配。

其次是原料结构的地方化。苏州时期中元造纸试验所试制蚕种纸,主要依赖进口木浆;内迁之后,外来原料来源受阻,地方资源开发遂成为必然选择^[12]。据档案记载,1941年中元造纸厂自创马尾松苛性钠法,制成碱性化学木浆,并用于牛皮纸生产^[11]。这一技术转变具有重要意义:其一,企业实现了由进口浆料向本地木材资源的替代;其二,地方资源得以通过技术改造进入现代工业流程;其三,企业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因而降低。换言之,地方适应并非“就地取材”的自然结果,而是技术能力作用于区域资源后的工业化转换^[1]。

再次是产品结构与市场方向的调整。中元造纸厂在宜宾初期生产打字纸、道林纸,随后又根据后方需求试制香烟纸。销售统计可以更清楚地说明这一调整的效果:1941年上半年,该厂总收入约48万元;同年9月至12月,薄型纸、牛皮纸、单面光道林纸和鸡皮纸等产品合计收入约150万元,其中薄型纸1万令,收入40余万元;牛皮纸800令,收入40余万元;单面光道林纸600令,收入64万余元;鸡皮纸200令,收入6万余元,较同年上半年增长3.3倍多^[11]。这说明企业已开始依据后方市场结构调整产品组合,并通过品类扩展提高收入能力。更为关键的是,中央机关与后方公共机构对纸张的制度性需求,为企业提供了稳定销路。中央信托局、中央宣传部、西川邮局等部门先后致函要求试制或供应钞票纸、薄型印刷纸、电报纸等。企业正是在一般商品市场之外,进入国家支配下的专门需求体系,从而获得扩张机会。

其中,钞票纸项目是中元造纸厂经营重建的关键节点。香港地区沦陷后,进口钞票纸来源断绝,中央信托局急需国内替代生产。据档案所见,中元造纸厂于1941年申报借款并获批500万元,用于扩建和试制钞票纸;随后购入武昌白沙洲造纸厂旧纸机进行改装。由于设备老旧且零件损坏严重,厂方需借助中央机器厂修理大型部件,小部件则自行拼装。历经试车,1943年3月正式生产钞票纸。此后,中央信托局与中央银行发行局先后签订供货合同,并在运输、原料、电

力等方面给予特别支持^[11]。钞票纸项目不仅使企业进入国家金融物资生产序列，也显著增强了其资本积累能力。

资金重组则构成经营重建的另一重压力。中元造纸厂虽在迁川前已有试验所和股份公司资产，但内迁后设备运输、购地建厂与购置机器支出巨大。据艾约博教授的研究可见，仅由苏杭迁川的200余吨设备，运输费即达30余万元；1939—1940年购地、建房与购机又支出130余万元。尽管企业将既有资产折算为资本，并后续多次增资，仍需以纸张作抵押向银行借款，一度拖欠骨干员工工资。1944年又增资至5000万元，反映出战时扩张对资本需求之巨。由此可见，战时民营企业即便获得国家扶助，其经营基础仍然薄弱；所谓“繁荣”，往往伴随高负债和高风险^[12]。

尽管如此，中元造纸厂仍逐步建立起较完整的地方经营网络。其一，通过土地契约、田赋缴纳与厂区扩建，企业已在宜宾形成固定资产基础。其二，通过运输处、通讯处及驻外机构设置，企业建立起连接宜宾、重庆及其他采购地的物流体系^[13]。其三，通过与宜宾电厂、地方行政机关及中央金融机构的往来，企业被纳入一个跨地方、跨部门的资源调度网络之中。经营重建由此不再只是厂房恢复，而是生产条件转换与地方资源整合同步推进的结果。

3 从异地存续到地方嵌入：中元造纸厂战时适应机制的形成及其限度

中元造纸厂在宜宾的战时发展，大体经历了由“异地存续”到“地方嵌入”的转变。前者强调组织与生产能力在迁入地未告中断，后者则指企业已在要素获取、劳动力再生产、制度安排和社会联系上形成相对稳定的在地基础。档案材料表明，中元造纸厂适应机制的形成，主要体现于组织制度化、技术—人才再生产和工厂社区化三个层面^[11]。

首先是组织制度化。1942年以后，中元造纸厂逐步建立较为完备的管理系统，设有总经理室、厂长室、财务室、设计室、试验室、业务室及通讯、运输等部门。至1945年，其组织分工已扩展至制浆、漂洗、打浆、造纸、包装、工务、人事、稽核、材料等环节。《办事程序总表》《组织系统表》《工友服务规则》等档案显示，企业对任免、考勤、奖惩、工时、验放、加班与安全等均作出明确规定。就经济史而言，这表明该厂已由草创阶段的技术合伙企业，转向管理制度较为细密的近代工厂^[3]。战时地方适应并不仅是取得外部资源，更包括通过制度化管理稳定内部秩序。

其次是劳动力与技术人才的再生产^[17]。中元造纸厂并未将员工仅视为一般劳动力，而是持续构建培训体系。档案显示，该厂先后开办造纸培训班、艺徒训练班和工友进修班，课程涉及数学、化学、物理、造纸机械及操作技术，并强调夜间理论学习与白天跟班实操相结合。其结果，一批艺徒和工友逐步成长为机台、工段和车间骨干，一部分还被输送至其他纸厂^[11]。此种做法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缓解了战时后方专业技术人才匮乏的困难；另一方面，它使企业得以通过“内部培养”实现知识与技能的地方沉淀。地方适应因而不只是资源嵌入，也是技术与人力资本的在地化积累^[12]。

再次是工厂社区的形成。随着员工人数由百余人增至千人左右，中元造纸厂陆续修建宿舍、食堂、医务室、浴室、图书室、幼儿园、子弟学校及球场等设施，并通过员工联谊会、识字班和戏剧、体育活动维持工厂内部公共生活。相关章程、简章和诊病统计表表明，企业已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起生活保障、文化教育与卫生服务功能^[11]。此种“工厂—生活共同体”的形成，不仅有助于稳定员工，也意味着外来企业与地方社会关系开始由单纯雇佣延伸至日常生活层面。地方嵌入由此获得了社会基础。

此外，产品结构扩张与市场声誉提升，进一步强化了中元造纸厂的地方嵌入。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该厂已能生产牛皮纸、道林纸、打字纸、新闻纸、香烟纸、钞票纸、电报纸、绝缘纸等多种产品，并在迁川工厂联合会及省级展览中屡获奖励。产品广告、价目表和试验报单反映出企业已具备较稳定的品牌识别与质量控制能力。这意味着中元造纸厂在地方取得的不仅是生产空

间,更是在全国后方纸张市场中的制度性位置与行业声誉。

然而,这一适应机制具有明显历史限度。其一,企业发展高度依赖战时国家需求与统制支持。无论钞票纸订单、原料调拨,还是电力保障、运输优待,均与战时财政和后方生产体系密切相关。一旦战争格局变化,企业原有优势即可能减弱。其二,企业资本结构始终不稳。虽然大额订单推动其扩张,但厂房、设备与原料投入巨大,借贷依赖明显,经营基础并不稳固^[9]。其三,企业家的经营重心在战后发生转移^[13]。档案显示,抗战胜利后,钱子宁等人逐步抽调资金和技术力量赴上海及他地投资,导致企业内部技术力量下降、资本外流。其四,战后沿海贸易恢复,外纸重新进入市场,后方纸厂的替代性优势被削弱^[11]。与此同时,恶性通货膨胀和工资危机又进一步侵蚀企业经营能力。上述因素叠加,使战时形成的适应机制难以平稳过渡至战后环境^[18]。

其他内迁民营企业的经验也可为这一判断提供旁证。刘鸿生企业和荣氏企业的西南经营表明,大型民营企业在战时扩张中同样需要借助政府贷款、原料配额和销售网络重组^[6];豫丰纱厂、天厨味精厂等案例则显示,中小企业往往通过地方原料替代、生产工艺调整和区域市场对接来维持经营^{[19][20]}。与这些案例相比,中元造纸厂的特殊之处在于钞票纸等国家专门订单在其扩张中占据突出位置,但共同之处在于:迁入地基础设施、地方原料、政策扶持和企业内部治理共同决定了企业的适应程度。由此,本文关于“地方适应”的结论,更多指向战时内迁民营企业中较为普遍的机制性问题,而非以中元造纸厂替代所有企业类型。

因此,中元造纸厂的经验表明,战时民营企业的地方适应是一种特定制度环境下的阶段性构造。其核心在于通过国家支持、地方资源与企业能力的结合,解决“如何在后方生存并扩张”的问题^[3]。但其局限也在于,这一机制并未根本摆脱对统制需求、核心企业家与特殊市场的依赖。企业能够在战争中成长,并不意味着能够自动完成战后转型。

4 结语

中元造纸厂内迁宜宾的历史表明,战时民营企业的存续逻辑不能仅以“内迁”概括。地理迁移只是前提,关键在于企业能否在迁入地重建生产条件、组织秩序与市场联系。就中元造纸厂而言,其战时发展主要依托三方面力量:一是国家统制体系所提供的迁建许可、贷款、订单与运输支持;二是宜宾地方社会所供给的土地、电力、水运、原料与劳动力条件;三是企业自身的技术储备、制度建设与人才培养能力。三者互动,推动企业由迁川工厂转变为后方重要机制纸企业。

本文的个案分析说明,战时民营企业的地方适应,本质上是一个资源再组织、制度再联结与社会再嵌入的过程。中元造纸厂能够在宜宾取得一度繁荣,正源于其完成了由“异地存续”到“地方嵌入”的转变。但其战后危机同样表明,这一适应机制具有鲜明的历史条件性。就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而言,该案例提示我们:对战时工业内迁的理解,不能止于迁移规模与政策叙事,而应进一步深入企业层面的经营重建与地方化过程^[1]。唯有如此,方能更准确把握战时民营企业的真实运行逻辑。

参考文献:

- [1]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四川省志·轻工业志[M]. 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 1993.
- [2] 黄立人. 抗日战争时期工厂内迁的考察[J]. 历史研究, 1994(4): 120-136.
- [3] 孙果达. 民族工业大内迁: 抗日战争时期民营工厂的内迁[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1.
- [4] 张守广. 抗战大后方工业研究[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2.
- [5] 江满情. 论战时民营工厂内迁中的国民政府与企业主[J]. 抗日战争研究, 2010(2): 106-112.
- [6] 蒋宝麟. “有限内迁”与经营扩张: 战时大后方的刘鸿生企业(1937-1945)[M]//张宪文. 民国研究: 第15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
- [7] 卢徐明. 纸张与战争: 全面抗战时期四川的纸张紧缺及其社会反应[J]. 抗日战争研究, 2019(4): 103-119.
- [8] 邵金耀. 造纸工厂内迁对内地造纸业发展的影响[J]. 民国档案, 2003(1): 110-114.
- [9] 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 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工商企业[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9.
- [10] 戚荣达. 钱子宁: 中国现代造纸工业的开拓者[J]. 文史天地, 2023(2).
- [11] 宜宾市档案局. 宜宾近代民族工商业档案研究[M]. 成都: 天地出版社, 2018.
- [12] [德]艾约博. 以竹为生: 一个四川手工造纸村的 20 世纪社会史[M]. 韩巍, 译; 吴秀杰, 校.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7.
- [13] 颜俊儒. 近代中国传统造纸业的嬗变[D]. 成都: 四川大学, 2005.
- [14] 苏智良. 去大后方: 中国抗战内迁实录[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 [15] 诸葛达. 抗日战争时期工厂内迁及其对大后方工业的影响[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4): 43-49.
- [16] 王晓林.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企业内迁研究[D]. 徐州: 江苏师范大学, 2018.
- [17] 袁为鹏. 聚散与扩散: 中国近代工业布局[M]. 上海: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8.
- [18] 邸志萍. 抗战时期的纸张与出版业[J]. 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6).
- [19] 刘玉莲. 战时荣氏企业内迁研究(1937-1945)[D]. 无锡: 江南大学, 2023.
- [20] 陈景拴. 抗战时期民营企业内迁历程探析: 以豫丰纱厂为例[J].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18.